

“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意味深长的一章”

——泰戈尔与维多利亚·奥坎波的跨国情缘

尹锡南

内容提要 泰戈尔与阿根廷女作家、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历史交往是印度和西班牙语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并对各自的创作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忘年情谊既是精神之恋和世俗之恋的融合，也是东西文明对话的真实体验，涉及到语言、文化和性别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泰戈尔与奥坎波的跨国情缘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 泰戈尔，维多利亚·奥坎波，《吉檀迦利》，西班牙语文学

Abstract: The 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Victoria Ocampo, Argentina Woman writer and translator,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lation between Indian literature and Hispanic literature, which in turn had some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ir writings and minds respectively. The love between each other is a combination of transcendental and secular ones and it could also be considered as the real experience of the dialogu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civilizations, which has some relations to language, culture and gender, etc. There are profou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the friendly contacts between Tagore and Victoria Ocampo.

Key words: Rabindranath Tagore, Victoria Ocampo, *Gitanjali*, Hispanic literature

1913年，泰戈尔因自译英文诗集《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此在东西方世界声名鹊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泰戈尔频繁地造访东西方世界。这不仅丰富了他的创作和思想，也促进了殖民主义时期的东西文学交流和文化互动。其中，他和阿根廷女作家和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 1890—1979，下简称奥坎波）的历史交往是印度和西班牙语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1985年，印度女学者黛森（Ketaki Kushari Dyson）出版孟加拉语著作《泰戈尔与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友谊》（Rabindranath o Victoria Ocampo sandhane）。1988年，印度文学院出版黛森的英语著作《在你鲜花盛开的花园里：泰戈尔和维多利亚·奥坎波》，该书1996年重印。书名取自泰戈尔在阿根廷养病期间接受奥坎波照顾时为其写的诗《最后的春天》中的句子。黛森在书中写道：“由于主人公的特殊身份，泰戈尔和奥坎波的故事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意味深长的一章。这也是一种人类的故事，有着鼓舞和启迪后代的力量，其他人由此受益匪浅。它不仅让人明白，这种友谊是如何开始并建立起来的，并且还让人懂得可以怎样增进这种友谊。泰戈尔和奥坎波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个人友谊，也是男人与女人之间跨越巨大代沟的一种友谊（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¹这说明，他们的历史交往不仅是殖民时期东西文学交流的重要一章，也是透视当代东西文化互动的一面理想镜子。“西方常用镜子来强调文学作品的逼真和完全，中国常用镜子来强调作者心灵的虚静和澄明，印度则用镜子来强调世界的虚幻和无尽。”²历史是当代人的一面镜子，泰戈尔与东西方智者的文学交流当然也是一

¹ Ketaki Kushari Dyson, *In Your Blossoming Flower Garden: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Victoria Ocampo*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96) 351. 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一律随文标注页码，不再一一加注。

² 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面镜子，一面生动无比、发人深思的镜子。我们在这面理想的历史之镜中看到的既有真实与虚幻，也有启迪心灵的“澄明”。

一、异国情缘与艺术表达

1890年亦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四年，维多利亚·奥坎波出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与大她29岁的前辈、印度作家泰戈尔一样，奥坎波自幼便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她喜欢阅读欧洲文学，孕育了一颗敏感而文学的心。“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英语文学和法语文学，正是文学激发了她的叛逆精神。”⁽³⁰⁾1931年，她创办了著名的西班牙语文学杂志《南方》(Sur)。《南方》杂志在二十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成为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它的政治立场倾向自由激进，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历史作用。1933年，与杂志同名的“南方”出版社成立，开始出版西班牙语文学作品，以及以西班牙语翻译的欧洲和北美当代文学经典。《南方》出版社后来还翻译出版印度作家的作品。奥坎波自己则翻译出版了阿尔伯特·加缪、T.E.劳伦斯和格拉汉姆·格伦等人的法语或英语作品。奥坎波曾经获得哈佛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并任阿根廷皇家文学院院长。

由于奥坎波的地位和财富，更由于她的兴趣爱好，她自然成为阿根廷文艺界的一名保护人。她起初主要以法语进行著述，五十岁时转向西班牙语著述。她有十卷论文、六部回忆录和论述泰戈尔、甘地、尼赫鲁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著作，还有散见各种杂志的文章。

奥坎波与泰戈尔相知相识的尘缘来自于她对印度文化的浓厚兴趣。1961年泰戈尔百年诞辰之际，在应邀撰文纪念泰戈尔时，奥坎波这样写道：“我非常感激甘地和泰戈尔这两位诞生在遥远国度里的人，他们属于和我明显不同的一种文明和种族……就泰戈尔而言，我们的道路则是纵横交错，不分彼此，这是我永久的幸福。”¹奥坎波在晚年回忆录中记叙了她与泰戈尔精神邂逅的最初经历。1914年，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在巴黎出版自己依据英文翻译的法文版《吉檀迦利》，这使24岁的奥坎波有机会开始接触泰戈尔的代表作。当时，她的婚姻遭遇挫折，处于心绪迷茫之际。捧读经过二次语言过滤的《吉檀迦利》，奥坎波的心一下子被征服了。她在回忆录写道：“泰戈尔诗中谈到的爱，并非那种折磨我的或使我狂喜的爱，而是导向神灵的爱，可以向神灵倾诉我全部的情感……这就是为何读着《吉檀迦利》时，我会带着绝望和痛苦而流泪哭泣……泰戈尔的神啊，谁又比我更懂得这离别之苦？”(57-58)

1924年11月7日，泰戈尔抵达阿根廷。当时，奥坎波还是一位名气没有超出国内的女知识分子。她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是：“她崇拜欧洲文化，对印度一无所知，但却渴望冲破她曾经受其熏染的、令人窒息的狭隘而庸俗的文化氛围。”

(254)生病的泰戈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需要静养，这对时年34岁的奥坎波而言，无疑是亲近心中偶像的天赐良机。她设法租下了普拉特河畔的桑伊斯德罗别墅，让泰戈尔及其秘书列奥纳多·埃赫姆斯特(Leonard Elmhirst，汉译“恩厚之”，即陪同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英国秘书)入住。泰戈尔在这里受到崇拜自己的奥坎波无微不至的热情招待，病情好转，并最终康复。

在桑伊斯德罗别墅近两个月的时间中，泰戈尔和奥坎波这对忘年交的感情迅

¹ S. Radhakrishnan et al., eds., *A Centenary Volume: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61) 46.

速升温。就奥坎波而言，她仿佛是当下追星族里的一员“粉丝”，时刻想着亲近泰戈尔这位神灵般的师尊（Gurudev），聆听他的声音和教诲。她回忆道，在离开泰戈尔不远的地方住着，每一分钟都不堪忍受。她常常在害羞和渴望之间挣扎。“因此，我逐渐地熟悉了泰戈尔和他的脾性。慢慢地，他或柔或刚地似乎驯服了那只小动物（指奥坎波本人），她没有像小狗那样睡在他门口外的地板上，只是因为这本不可能。”（333）作为生性敏感的诗人，泰戈尔很快就察觉了奥坎波对自己的热情。泰戈尔按照奥坎波的西班牙语名字 victoria 的含义给她起了一个梵文名字 Vijaya，意思也是“胜利”。他在阿根廷期间写下了很多以奥坎波为倾诉对象的孟加拉语诗歌。他还将其中少数几首译为英文，让奥坎波阅读。例如，泰戈尔在《佳宾》（Atithi）一诗中写道：“女郎，你以友情的甘美琼浆/充实了我访问的时间；/你那么轻易地使来自/遥远异邦的旅人感到亲切自然/……/啊，女郎，我不懂你的语言，/可听懂你弹的歌曲—/爱情的客人—诗人，/你是永久的佳宾。”¹

泰戈尔病愈后本想早日离开，但禁不住奥坎波的热情挽留又呆了一段日子。为此，奥坎波还变卖了自己的一颗宝石以作别墅的租金。1925年1月3日，泰戈尔挥别奥坎波，乘船离开了阿根廷。奥坎波把泰戈尔在别墅坐过的扶手椅赠送给他，后成为《泰戈尔全集》（Purabi）并命名为“小莲花”直至人生终焉。1925年，泰戈尔题献为“献给红手似莲花的佳宾”佳宾即他给奥坎波取的梵文名字。这足以证明奥坎波在诗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阿根廷一别后，泰戈尔与奥坎波还见过一面。1930年，奥坎波来到巴黎，帮助泰戈尔举办个人画展。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自1925年起，他们之间的通信时断时续，直到泰戈尔辞世。在通信中，两人还延续着忘年之交的友谊。从泰戈尔方面来看，中年丧妻、内心孤独的他似乎非常痴迷于这段尘缘，当然就更为痛苦。他不仅在诗歌中书写这段美丽的异国尘缘，还在小说、戏剧中不断地表现它。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段时期的很多绘画也以对奥坎波的无尽思念为表现主题。和哥德一样，泰戈尔喜欢光亮，并喜欢更为恢弘广大的空间。但是，他的很多画都以灰暗阴森的色调做背景，画中常常出现扶手椅的艺术变形和神似奥坎波的面容身形，或是出现两个男女若即若离的身影或面容。在1930年的泰戈尔巴黎画展上，一些西方人看到了这些画后认为，这些画中人贪婪而色情，有的则令人恐怖。但如对画的背景有所了解就会明白，泰戈尔画作中的黑暗背景其实是他内心痛苦的一种象征，有一种难以释怀的、不可言说的艺术张力，扶手椅等景观和男女对视则表明了印度与阿根廷之间、亦即泰戈尔和奥坎波的时空距离无法跨越。因此，说画中有深意当不为过。²泰戈尔画作中不断出现的扶手椅意味深长。在黛森看来，奥坎波的赠物是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它代表心心相印的一种姿势。“某种意义上，这把椅子可以视为它遥不可及的赠予者，它成了她的代表或替代物……作为全心托付和亲密无间的象征，这把椅子当然代表彼此相爱。椅子载着他，就像她托起他一样。坐在椅子上，他立刻会在幻念中想起他，在思想中把她拥住。”（327）

泰戈尔在作品和绘画中对奥坎波长达十几年的深情倾诉和痛苦思念，足以说明，他是非常虔诚地对待这段忘年尘缘的。那么，奥坎波是否也对这位印度师尊一往情深呢？那把作为赠物而漂洋过海陪伴诗人余生的椅子，是否真的暗示奥坎波对诗人的心心相印呢？

二、世俗之恋与精神之恋

¹ 泰戈尔：《佳宾》，白开元译，刘安武等主编：《泰戈尔全集》（5），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

² 无独有偶，笔者早年研究泰戈尔时，也曾对他某些带有抽象色彩的画作百思不解。笔者曾经参加2004年和2006年的两届印度文学研讨会，听到长期翻译泰戈尔孟加拉语作品的一位学者说，泰戈尔的绘画艺术并不高明，赶不上他在音乐方面的造诣。

早在远古时代，印度民间就流行对女神和生殖力的崇拜。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湿婆的身体便是他与女神合二为一的结果，因此，他便呈现雌雄同体的特征，面容也为阴阳各半。十世纪从湿婆派分裂出崇拜女神的性力派，它结合了民间的生殖力崇拜信仰。它是印度教三大教派之一，盛行于泰戈尔所在的孟加拉和阿萨姆、奥利萨等地。该派认为女神的性力是神圣无限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根源。黛森认为：“甚至和今日的绝大多数男性同性恋艺术家一样，泰戈尔需要超越普通友谊的女性作为触发灵感的诱因，以为自己创作的‘性力’（zi-, ÷akti，或译

‘神力’）。”^{（5）}虽然不能说接受过西方自由思想启蒙的泰戈尔会以性力派的观点自觉指导自己的创作，但他对奥坎波的赞美和无尽的思念使其作品韵味悠长，这又不能不使人感叹非同寻常的女性友谊对于他是何等重要。中年丧妻丧女的不幸带给泰戈尔心中无比孤寂，这与他渴求女性柔情，从而在诗歌、小说乃至绘画艺术中排遣愁绪是有联系的。

1924年11月16日，泰戈尔在奥坎波为他安排的别墅里写下题为《看不见的女人》（Antarhita）的诗，其中表达了对爱的期待之情。而在次日即11月17日的《担忧》（Ashanka）一诗中，泰戈尔表达了另外一种不宁的心绪。也许是泰戈尔意识到自己的激情喷涌得不是时候，他陷入到内心的挣扎之中。他写道：“更多的爱的赠礼，/你若塞进我手里，/我内心深处的缝隙/岂不暴露得更清楚？/明智之举是还清欠你的债，/驾空舟踏上归途。/爱情的饥饿的滋味/最好在背后细品。/收回吧，收回/你那颗充满爱慕的心！”¹1925年1月9日，在离开阿根廷奔赴欧洲的船上，泰戈尔又陷入对奥坎波的思念之中。他在诗中写道：“遥远的陌生的地方，/我孤独地流浪，/风暴摇晃着小船—/此刻为什么突然/想起大地最远的尽头，/天堂垂落之地，/某一天，意外地相遇，/只有我和你。”²从这些描写来看，泰戈尔对奥坎波的确充满了爱恋之情。

再看看奥坎波对泰戈尔的感情。泰戈尔是她早年的青春偶像，《吉檀迦利》是她精神处于危机时刻的缓冲剂。1924年，当真实的泰戈尔站在眼前时，那种崇拜之情油然而生。她一次次亲近泰戈尔，聆听他朗读孟加拉语诗歌的天籁之音，并聆听他的教诲，这的确暗合了印度古代师徒相随相习的传统。虽然当时她和丈夫分居，但却还有一位情人，为了某种原因，她对泰戈尔守口如瓶。这使泰戈尔以为她的热情亲近是世俗女子的一种示爱方式。他在离开阿根廷奔赴欧洲的旅途中给奥坎波写信说：“我告诉你这一切，因为我明白你爱我……我相信，你的爱会以某种方式帮助我获得成功。”^{（317）}他还向秘书埃赫姆斯特透露，他之所以要尽快离开奥坎波，是害怕自己不能承受她的热情。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奥坎波在回忆录中曾经叙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它反映了当事双方很多微妙的心绪，同时也揭示了奥坎波对泰戈尔的真实情感。她写道：“有时候，我看见他（泰戈尔）用神秘的孟加拉语字母写啊，写啊，写啊，我就会央求他翻译部分诗给我看看。一天下午，当我进入他的房间整理瓶中的鲜花时，他告诉我说正在翻译。我朝着桌面上的纸页看去。他没有抬头看我就张开一只手臂，像握住树枝上的果实一样，把手放到我的一只乳房上。如同马意外地受到主人鞭打，我感到瑟瑟发抖，想要退开。我内心在叫：‘别，别这样！’我内心里的另外一个我提醒说：‘冷静点，笨蛋。这只是异教徒示好的一种姿势罢了’（Be calm, fool. It's a

¹ 泰戈尔：《担忧》，白开元译，刘安武等主编：《泰戈尔全集》（5），第126—127页。

² 泰戈尔：《相会》，白开元译，刘安武等主编：《泰戈尔全集》（5），第168页。

gesture of pagan tenderness, 奥坎波此处的手稿删去了另外几个字: ‘这不是老糊涂的粗野下流 (and not of senile lewdness)。’) 那只手在无形的爱抚中离开了 ‘树枝’。我继续看诗。我想, 他应该将此姿势作为一种雕塑。但是, 他再也没有做过类似动作。每天, 他都亲吻我的前额或面颊, 并握住我的一只手臂说: ‘好冰凉的手臂啊 (Such cool arms)!’” (272) 这里的叙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 泰戈尔对年轻美丽的女主人亦即自己的崇拜者充满了柔情蜜意, 他对奥坎波的举动应是 “感情谬误” 和 “文化误读” 下的真情流露, 但又十分尊重对方的感受和意愿, 不失风度地适可而止; 第二, 奥坎波对泰戈尔的爱确实不属于男女之爱的范畴。她无法像恋爱中的女人那样正常应对泰戈尔自然流露的热情, 但又机敏睿智地保护了心中偶像的自尊。否则, 他们之间的个人交流史亦即东西文化交流史将不得不遗憾地进行改写。那么, 奥坎波对泰戈尔的爱究竟属于哪一种?

奥坎波从未直接流露她对泰戈尔感情的真实看法, 相反, 她在信中还以积极热情的姿态回应诗人。但有时候她的信也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让人揣度和琢磨出一些微妙的信息。例如, 她在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中写道: “的确, 有时候, 我的爱会使我自己受伤……但这只是一种标志, 表明我的爱对你仍然不够美好。”

(260) 奥坎波坦露心迹, 认为自己对泰戈尔的爱不够完美理想。其实, 她是认为, 自己对泰戈尔的爱仍然停留在世俗情爱的层面, 富于占有色彩, 不是那种完美高尚的爱。她渴望与泰戈尔进行思想层面的交流, 想让他明白, 她是如何理解、又是怎样热爱他的作品。为此, 奥坎波在写给泰戈尔的信中带着一种 “调情”

(love-pique) 的口吻说: “你会在某个时候明白的, 我是多么地热爱你的作品啊! 这种心情是可以翻译的。但我想, 你也许永远不会明白, 我是多么爱你, 因为, 除你之外, 没有谁能翻译这种心情。这种翻译要耗费很长的时间, 而你却一直有新诗要写。” (260) 这里的话已经透露出一种徒弟对师傅的虔诚敬意, 同时也暗含深意和善意。这好比印度古典梵语诗歌《牧童歌》(Gitagovinda) 中拉达 (Radha) 对大神毗湿奴化身之一的黑天的柔情倾诉。“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它, 这都是一种文化的产物, 它鼓励妇女们用性爱神秘主义的语言 (the language of erotic mysticism) 表达内心的爱。” (260) 而在奥坎波所属的基督教文化中, 也不乏这种例子。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便在作品中描述过这一情形。奥坎波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参透了这种秘密, 因而向她在信中一直称为 “师尊” (Gurudev) 的泰戈尔恭敬地表达一种 “纯粹的精神恋爱” (entirely spiritual love), 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恋爱, 或者说, 奥坎波是 “以世俗情爱语言表达那种所谓的精神恋爱语言”。(261) 奥坎波的传记作者 E. 萨尔蒙 (Ellinor Salmon) 所说的话也可以证明, 她对泰戈尔的爱不是世俗的男女之爱, 而是一种超越之爱, 一种近似于奥义书时代的师徒之爱。萨尔蒙说: “我最欣赏奥坎波的地方是, 她对精神真理有着深深的渴求和本能的反应。她对泰戈尔的爱有力地证明, 她的心如何向神灵敞开, 神会给她指路, 这条路使人超越黑暗世界而到达光明世界。泰戈尔帮助奥坎波体验了欢乐, 这本质上是灵魂的欢喜, 它不能由思想来描述或理解, 因为这种欢乐本身就是体验亲证。” (266)

1925 年 1 月 3 日, 当泰戈尔离开阿根廷时, 奥坎波一夜未眠, 挥笔写诗。她在临别时塞给泰戈尔一首诗和的一封信, 大抵是让其阅读。诗中写道: “世界上距我最近的人, 是我感到距离最远的人; /世界上距我最近的人, 并不知道他与我如此临近; /世界上距我最近的人, 却并不懂得我这样的人; /……/我的心是如此沉重啊, 此等重量我又怎能承载? /我心烦意乱。拔出那误会之刺吧, 做

我的友人!”¹从这首诗来看,奥坎波对泰戈尔的确是充满了柔情。但如果联系前的分析,我们会有新的结论。距离最近的人却是距离最远的人,这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但这发生在泰戈尔和奥坎波之间,的确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拔出那深入心灵的“误会之刺”,做一个普通而又超俗的友人,这应该是奥坎波内心的真实想法。说到底,奥坎波对泰戈尔的爱有些接近于《吉檀迦利》中那种神人不分、却又超凡脱俗的恋爱境界。但如此一来,泰戈尔对奥坎波的深情便少了许多精神恋爱的成分,因为它混合了世俗之恋的色彩。写出空灵境界的泰戈尔,本来应该是超凡脱俗的神灵象征,但却在对奥坎波矢志不移的绝望之爱中体现出人性或世俗的一面。这和奥坎波对他的爱形成反差。事实上,这更体现出泰戈尔作为现代诗人的真实一面。

三、语言障碍与思想分歧

当泰戈尔 1924 年 11 月到达阿根廷时,他本想继续前进,探访秘鲁和墨西哥,增进印度和南美大陆的文化理解,但却因为生病等因素,未能完成这一心愿。但是,他同奥坎波的这段跨文化尘缘还是令他欣慰的。不过,这种欣慰的背后潜藏着很多遗憾。其中,阻碍他们深入交流的语言障碍是一大因素。

在阿根廷期间,奥坎波和泰戈尔只能用英语交流。这当然不如他们以各自最擅长的语言进行对话更为方便。在奥坎波看来,泰戈尔最好懂得她擅长的法语,而泰戈尔则希望奥坎波能学点孟加拉语,直接阅读他的孟加拉语诗歌。泰戈尔离开阿根廷后致奥坎波的信中写道:“不幸的是,语言障碍限制了我们轻松地能够通思想,因为你对我正好熟悉的唯一一门欧洲语言(英语)从未完全适应……我深感遗憾,我没能完全熟悉你的性格,这种困难由于你的文学性格而增大。”²泰戈尔给奥坎波的越洋信,几乎都在信封上把她的姓名写错。直到 1936 年,泰戈尔才把奥坎波的姓名写对。1924 年 11 月 21 日,泰戈尔在《最后的春天》(Shesha basanta)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奥坎波狂热亲近的害怕。他写道:“你心里不必焦虑, /你鲜花盛开的花园里, /我决不无故迟延, /也不会频频回首顾盼, /在白昼离别之时。 /我不索要你的热泪,我只希冀/保存充满温存的恒久的记忆。”³他曾经给奥坎波翻译过几首自己创作的孟加拉语诗歌,但是,这首《最后的春天》并未英译给她看。因为,泰戈尔明白,翻译这首诗难度很大。首先,该诗近似于欧洲游吟诗人对女子殷勤献诗,其中某些柔情似水的句子在西方读者看来,有些自作多情、无病呻吟的味道。“由于文化差异,对于西方专业学术圈以外的读者而言,很难理解《最后的春天》的抒情描写。即使存在西方传统内部的文化差异,他们可能也会理解欧洲过去的游吟诗人,但他们不可能轻而易举地理解亚洲的传统诗歌。”(137)其次,泰戈尔不愿意翻译这首诗,也考虑到孟加拉语诗歌的音乐性会在翻译中丧失殆尽,这反而会影响到自己的声誉。

泰戈尔离开阿根廷后,奥坎波在写给他的信中说:“纪德的翻译的确很棒,充满灵感。这是我真心推崇的唯一译本。法译《吉檀迦利》第二首非常美妙。我很难想象,还有哪种语言能译得这么好……不过,自然,我这样说是错误的,我

¹ Ketaki Kushari Dyson, *In Your Blossoming Flower Garden: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Victoria Ocampo*, pp.380-381.笔者认为,前几年在网上传阅的假托泰戈尔的诗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与沃坎坡此诗神似,是否为作者受沃坎坡启发而作?当然,也不排除假托之作是原创的可能。但当初为何有人将该作与泰戈尔联系起来,实在令人费解。

² Krishna Dutta and Andrew Robinson, eds., *Selected Letter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16.

³ 泰戈尔:《最后的春天》,白开元译,刘安武等主编:《泰戈尔全集》(5),第128页。

必须学点孟加拉语。”(399)但直到泰戈尔逝世,奥坎波仍然只记得一个孟加拉语词汇:Bhalobasa(爱)。这个词是泰戈尔在阿根廷时或许饱含深意地教给她的。后来,她在1961年为纪念泰戈尔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撰文时,以她唯一掌握的这个词结尾,作为对泰戈尔的历史回应。她写道:“泰戈尔在逗留桑伊斯德罗期间,教给我一些孟加拉语词汇。我只记得一个词,我将一直不断地用它对印度说:Bhalobasa。”¹鉴于此,黛森认为,只有我们当中更多的人自觉学习更多的外语,才能搭建座座坚固耐久的文化之桥。这种文化桥梁可以消解抵抗那些分裂人性或强加自己世界观于他人的政客阴谋,这些政客的世界观也与语言相关。黛森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偿还我们欠着泰戈尔、奥坎波和埃赫姆斯特这类智士的债。他们被高尚的梦想所激发,愿以友谊的纽带把不同民族和个人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必须的梦想,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除非我们心中有梦,否则怎使美梦成真?”(354)

语言因素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泰戈尔与奥坎波的深度对话。但是,深入考察奥坎波和泰戈尔的历史交往,我们还会发现更为复杂的一些因素,它们在两人的跨文化对话中扮演了消极的角色。这便是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思想分歧,这种涉及东西文化和女性角色的分歧导致了两人心灵对话的不完美。

1930年,泰戈尔再次见到奥坎波时,曾经邀请她陪同自己去剑桥大学进行讲学,然后再陪她返回印度。奥坎波因陪同一位朋友奔赴美国,便拒绝了他的提议。泰戈尔非常想念奥坎波,一再表达想在印度见到她的愿望。例如,在1936年10月19日致奥坎波的信中,泰戈尔写道:“我仍然珍藏着希望,但愿能有机会跨洋过海,在我辞世以前与你再次相见。”(449)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因为,1936年以后,泰戈尔的身体再也不允许他出访世界任何地方。1939年1月26日,泰戈尔在信中再次对奥坎波表达自己的美好心愿。此时距泰戈尔逝世只有两年的时间。他的热情终于打动了奥坎波的心。1939年2月23日,奥坎波在信中告诉泰戈尔,如果年底欧洲不爆发战争的话,她就到印度去。但当年9月爆发了二战,使得奥坎波无法兑现诺言。从此,她再无机会践诺。1941年3月26日,泰戈尔疾病缠身并知来日无几,他在诗中借描写奥坎波赠送的那把空空如也的椅子抒发无尽的思念和遗憾。他写道:“杳无人影的正午,/烈日炎炎。/怔视着落寞的躺椅,/上面竟无一丝慰藉。/它满腹失望的话语/似在叹息。/……/忧郁的双眼日夜四处寻觅。/躺椅的絮语似乎益发悲切,/空渺的哑默的伤感/在没有亲人的住所弥漫。”²当年8月7日,泰戈尔与世长辞。11月3日,泰戈尔的儿子写信把泰戈尔在3月26日写下的该诗英译文寄给奥坎波。1942年3月24日,奥坎波在写给泰戈尔儿子的回信中说:“我是多么懊悔啊,在师尊在世时未能去印度!我们一直都在想,在完成什么事情以前,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时间。我非常地爱他。”(465)

泰戈尔的遗憾和奥坎波的懊悔,表面来看,是两地遥远和二战爆发等客观因素使然,其实,除了两人错位的情感纠葛外,更主要的还是两人在文化观念上存在严重分歧。这是又一根深入灵魂深处的“误会之刺”。这或许是奥坎波在泰戈尔有生之年一直未去印度看望他的主要原因。奥坎波自己的话可以证实这一点。

在泰戈尔的时代,曾经有两位英国女子崇拜印度智者,来到印度并终其一生。她们就是追随宗教哲学家辩喜(Swami Vivekananda)的圣女妮韦迪塔(Sister Nivedita,其英文名为Margaret Nobel)和追随圣雄甘地的米娜贝亨(Mira-behn)。

¹ S. Radhakrishnan et al., eds., *A Centenary Volume: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 p.47.

² 泰戈尔:《最后的作品集》,白开元译,刘安武等主编:《泰戈尔全集》(8),第274页。

深深爱着奥坎波的泰戈尔曾经希望奥坎波仿效那些追随甘地或辩喜的西方女子，甘心牺牲自己的舒适生活，也来印度追随自己，为印度服务。在从 R.钱德（Rani Chanda）等人那里知道泰戈尔的意图后，奥坎波坦率地说：“牺牲？如果我剥夺自己的机会为他（指泰戈尔）做事，那才真是一种牺牲，做点什么事情是愉快的。我不敢把自己和那两位特殊的英国女性相比，我知道她们想的是什么……我嫉妒圣女妮韦迪塔和米娜贝亨的好运。我相信，她们也非常乐于奉献自己的生命。我说我嫉妒她们，也许没有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我不能嫉妒她们，因为我明白，我自己的‘正法’（dharma）（在西方我们叫它性格特征）不允许我成为她们，也不允许我步其后尘……我也应该完成一项不太重要的使命。这一使命要求我留在世界的这个角落。”（343）

奥坎波不去印度追随泰戈尔，是因为不愿效仿那些追随甘地或辩喜的西方女子而“牺牲”自己。她借用印度的“正法”概念陈述己见。她声称自己的“正法”不允许随意效仿别人，这其实也暗示了她受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女权主义思想影响。“奥坎波的女权主义思想主要来自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启发。她很崇拜伍尔夫并与之通信，论述她的思想，还发表自己翻译的伍尔夫作品。不过，她与伍尔夫的关系是单向的。伍尔夫并不真正了解南美或奥坎波的精神旨趣。”

（42）伍尔夫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著名意识流作家，也是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之一。1929年，她发表了长篇论文《一间自己的屋子》，对女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她说：“我只能贡献给你们一点意见，关于一件很小的事：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¹伍尔夫的女权主义思想对奥坎波的影响不可小视。她使奥坎波坚信，必须拥有自己的“正法”亦即女性的独立人格。

当然，换个角度看问题，奥坎波终其一生未去印度，对于她本人或对于印度和西方的文化交流而言，均是一种消极的因素。泰戈尔逝世后，她还可以有机会去印度的，但她始终未去。例如，她推辞了阿根廷驻印度大使的职位。这的确是一件憾事。光从书本上了解印度，肯定不如实地采风更加实惠。不能了解真正的异邦文明，就不能解决许多跨文化命题。因此，奥坎波心目中的印度文明仍然是神秘的宗教世界，或是泰戈尔笔下的神灵世界。其结果是，奥坎波对五彩斑斓的印度文化魅力缺乏足够的认识。

尽管诸多因素限制了泰戈尔与奥坎波的心灵对话，但他们还是对彼此的创作或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与奥坎波的跨国情谊丰富了泰戈尔的创作内容，对其诗歌、小说和绘画艺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奥坎波崇尚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思想也使泰戈尔受益匪浅，使其女性观产生了积极的变化。黛森认为：“与奥坎波这样的女性进行接触，除了激发泰戈尔的创作潜力外，还有助于他矫正对女权主义某些思想的反感，此前，他认为女权主义思想太过强悍。”（310）就奥坎波而言，泰戈尔的作品不仅是她年轻时陷入精神危机时的解渴甘露，还是她认识东方文学与文化的最好途径。奥坎波还从财力上力所能及地支持泰戈尔在印度创办的国际大学。泰戈尔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排斥情感、崇尚理性的反感，对奥坎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奥坎波曾在文章中表达了对法国当代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罗布·格里耶（Robbe Grillet）的唯形式论思想的反感，强调文学必须表现情感内容，而非一味创造形式。（330）勿容置疑，他们之间的文学和思想互动，成为印度现代文学和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西班牙语文学交流史的重要一章。

¹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2页。

余论

泰戈尔对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东西方作家、特别是诗人的影响存在地理差异。和中国的汉语新诗界一样，阿根廷和西班牙所代表的西班牙语诗歌界受泰戈尔的影响较为深刻，而叶芝、T.S.艾略特和庞德所代表的英语诗歌界基本不受泰戈尔的影响。这种接受影响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西班牙语诗歌界正脱离现代主义潮流而寻求新的创作风格，汉语诗歌界则是在五四新文学学习外国作家的时代背景下模仿和借鉴泰戈尔，而庞德等英美诗人所代表的现代主义诗风与泰戈尔崇尚情感抒发的浪漫主义诗风存在明显差异。

西班牙语文学界对泰戈尔作品的热情首先与几位翻译介绍者的努力密不可分，奥坎波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用泰戈尔作品的翻译，把印度与欧洲、拉美的西班牙语文学界联系在一起。因此，泰戈尔的孙女婿 K.克里巴拉尼（Krishna Kripalani）在闻知奥坎波逝世后撰文悼念她时，给文章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维多利亚·奥坎波：一座连接三大洲的文化桥梁。”¹

印度学者 S.P.甘古利高度赞扬奥坎波对于泰戈尔作品在西班牙语地区传播的功劳。他说：“一般来说，泰戈尔在阿根廷以及在整個西班牙语世界的接受，都与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名字相联系。”²事实上，随着与泰戈尔的不断交流，奥坎波对泰戈尔及其作品有了新的认识。她在阿根廷以西班牙语介绍和评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齐德拉》、《家庭与世界》和《邮局》等作品，并将法文版的泰戈尔作品翻译为西班牙语出版，还在当地以西班牙语演出《邮局》时担任顾问和导演。她对在南美乃至整个西班牙语文学界传播泰戈尔作品和东方文化贡献不小。“奥坎波对泰戈尔所有的评论，自然都以西班牙语发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和泰戈尔的交往，的确属于更大范围的西班牙语世界对泰戈尔的反应。”（66）

（本文删节后载于山东青岛大学主办《东方论坛》2011年第4期）

¹ Maria Renee Cure, "Tagore in Argentina Thanks to Victoria Ocampo," in Rita D. Sil, ed., *Profile of Rabindranath Tagore in World Literature* (Delhi: Khama Publishers, 2002) 112.

² Shyama Prasad Ganguly, "The Hispanic Response to Tagore," in Amiya Dev & S.K.Das, e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and Practice* (Shimla: 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1989) 193.